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主编 陈支平

徐建生 著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 沿袭与变异

(1912~1937)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研究丛书

主编：陈冠中

陈冠中 著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 沿袭与变异

（1912—1937）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主编 陈支平

徐建生 著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 沿袭与变异

(1912~1937)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革：1912~1937/徐建生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1

(中国经济史丛书/陈支平主编)

ISBN 7-211-05155-8

I. 民… II. 徐… III. 经济政策—研究—中国—1912~1937 IV. F1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7123 号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 (1912~1937)

作 者：徐建生

责任编辑：魏 芳

出版发行：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211@fjpph.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印 刷：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地 址：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350003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11.5

插 页：4

字 数：272 千字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00

书 号：ISBN 7-211-05155-8

定 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总序

经君健 郑学檬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组织出版“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是一件有多方面意义的举措。我们，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之一，闻之无不倍感鼓舞。经济史学既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也是历史学的基础学科，所以经济史学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学和历史学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曾是国人关注的研究领域。在确定中国社会性质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就曾起过重要作用。多少仁人志士在寻找救国道路时曾受到这些研究成果的启发，而站得更高，并在观察革命的根本问题时，能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角度去反思、去剖析，准确地把握国情，科学地作出判断。所以，要知道中国何去何从，就离不开中国经济史研究，过去如此，今后也是如此，事之必然也。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某些经济史领域，如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课题，在一些重大的学术讨论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虽然这些学术问题的理论思维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但仍不能否认其振聋发聩的作用，令学术界“悟诸未悟者”。但是更多的经济史学者，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遵循经济史学自身的规律，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深入各个研究领域，辛勤耕耘，

取得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他们的工作，不仅为后学打下坚实的理论、史料基础，而且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学风。

1978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突破了“左”的、极“左”的思想禁锢，重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迎来了学术界的春天。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经济建设主旋律的推动下，获得了空前的繁荣。硕果累累，新人辈出。年长的学者老树开花，总结多年的积累，写出长期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中年学者思想成熟，精品迭出；特别是日益增多的青年学者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勇于创新，取得了很好成绩，有厚望焉！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国外史学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中外学术文化、教育交流的频繁，老、中、青学者都以开放的、求实的态度吸收外国经济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因而使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了明显的扩展。

在以上所说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诞生了，一如雕龙跃笔海，彩凤栖文峰，令同行艳羡不已。这套丛书是百家争鸣的园地，是经济史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施展才华的空间。我们希望在这块土地上，既有以实证为基础，运用多种方法的扎实研究，也有逻辑严密、精辟深邃的理论探讨。希望这套丛书在学术上能做到兼收并蓄，并以多种风格的论著并存为特色，而严谨的学风则应该是丛书最重要的选择标准。

“青春去住随柳条，欲寄来人以为信。”祝贺“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的出版，并相信这套丛书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精品文库，对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2005年6月

序

《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1912～1937）》出版了，可喜可贺！

十多年来，作者以民国时期的经济政策作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兢兢业业，默默耕耘，坚持不懈，成效渐著：搜集和整理了大批资料，发表了多篇专题论文，承担并完成了《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一书中有关北洋政府时期经济政策部分的写作任务；攻读在职博士生期间，一面学习，一面继续研究，并以民国时期（1912～1937年）的经济政策为题，写作和提交博士论文，这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书稿。论文获得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为优秀论文，推荐参加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可见本书并非急就篇或泛泛之作，而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民国经济政策研究的心血结晶。我作为作者的博士生导师和书稿的第一位读者，为作者在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感到欣慰和骄傲。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变化和兴衰起伏，固然受到自然、政治、社会和市场等多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但政府的经济政策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兴衰、产业结构、经营方式、经济效益、利益分配等等，都能从经济政策找到答案。因此，经济政策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越来越受到研究工作者的重视，近年来，已有不

少研究成果面世。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不能说是开创性的，但有创新和发展，有新的思路、视角、观点、方法和内容、材料，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民国时期北洋和国民党两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连贯和整体的探究，突破以往将两者截然分开的研究模式，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以“沿袭与变异”概括二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政权性质、机构裁设、制度废立、人员去留、资产阶级参政的新旧替代、政策来源、政策思想和社会舆论发展轨迹，以及同西方列强的关系等的分析，揭示两者之间既有变异又有沿袭的内在联系，进而探究近代经济政策的阶段特性和整体共性。“沿袭与变异”，紧紧抓住了民国时期北洋、国民党两政府经济政策发展变化的脉络和特征，也是对经济政策和经济史研究的一种新的拓展。

在“沿袭与变异”的主线下，书中对北洋、国民党两政府的经济政策，从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到政府及官员的经济行为，从经济政策的外部环境到政策本身的内容实质，从政策的实施条件、手段到政策的实际执行，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考察分析。通过党政和立法途径制定发布的主要经济法规，北洋政府达100多项，国民党政府增至200余项，其间的传承、增删和修订，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统治阶级的经济意志和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变化。作者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经济法规，细心检索和梳理，扼要介绍和分析，使读者能窥其全貌。

不过，法律、法规以及条例、章程等只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及其官员的经济措施、经济行为是经济政策的另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更重要、对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所起的作用更直接的一部分。同时，各项经济法规、法律、条例、章程未必付诸实施：闭门造车，华而不实者有之；装潢门面，欺骗舆论，根本无

意实施者有之；虽愿实施，但限于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心有余而力不足者亦有之。一些经济法规、法律和条例、章程即使付诸实施，也未必能够不折不扣、自始至终和达到预期目的，往往虎头蛇尾、半途而废者有之；南辕北辙、事与愿违者有之；阳奉阴违、挂羊头卖狗肉者更有之。可见写在纸上的经济法规、法律和条例、章程条文是一回事，决策和制定者的真正意图及如何诠释、是否愿意和如何实施、取得何种效果，又是另外一回事。因此，本书并没有停留在对经济法规、法律等条文的介绍和分析上，而是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考察北洋和国民党两政府及其官员的经济行为，揭示其经济政策在制定、诠释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蜕变和背谬。权力和财力是实施经济政策的基本条件和手段，北洋和国民党政府曾围绕经济政策的实施条件，实行多项改革措施。但由于巩固统治尤其是财政需要，原本是“养鸡下蛋”的经济改革很快蜕变为“杀鸡取卵”的财政搜刮。在国民党的产业政策中，不乏以扶植、奖助和促进私人资本发展为主旨的法规文件，但实际推行的却是千方百计渗透、改组、没收和夺占民营企业的经济暴政。

最为荒唐和背谬的还是国民党土地政策的蜕变及其对孙中山“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革命主张的公开背叛。国民党政府土地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是1930年6月颁布的《土地法》。在此之前，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曾通过《土地法原则》，肯定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承认“人民有平均享受使用土地之权利”，为此“必须防止私人垄断土地”。但据此制定和颁发的《土地法》，却没有“平均地权”或“耕者有其田”的任何内容和条文。随着工农土地革命的发展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日益激化，国民党政府的土地政策加速蜕变和向封建大地主倾斜。1932年，蒋介石在亲自坐镇的豫鄂皖“剿共”总部发布的《土地处理条例》，强

调土地分配“重在均耕，不在亟亟均其所有”。具体办法是在承认和保护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向各村有耕作能力者“计口授田”。同时实行“限田”，准备规定私有田亩的最高限度，对地亩超额的地主，用累进法征课田租所得税，限制地主的土地收益，使其资金投向其他领域。并声称要通过“和平”和“渐进”的方式达到“耕者有田”。次年12月，蒋介石从南昌向南京发了一纸专谈土地政策的电报，全面推翻自己亲手制定的《土地处理条例》。他声称中国既无土地分配不公的情况，也不存在土地总量供应不足的问题；认为从全国人口和土地分配看，“不苦人不得地”，而是“地浮于人”；而且各省“亦绝少数百亩、数千亩之地主”，三数十亩的中小自耕农“确占半数以上”；中国土地“不患地主把持”。因此，他的结论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不是“平均地权”，而是“均佃”，即以合作社集体耕作方式，按各户耕作能力，“公平分佃，随时由社评定增减”。这样，蒋介石不仅推翻了自己刚刚提出的“限田”和“渐进”式均田设想，而且公开背叛了孙中山“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革命主张。

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是统治阶级经济意志的体现，其目的首先是维护和扩张统治阶级的利益，北洋和国民党两政府的经济政策、经济行为及其变异都是基于这一目的。但是，一个开明和进步的政权，在政策制定和利益分配等问题上，会在统治阶级和全体民众之间、在维护统治集团利益和保持社会安定、和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北洋、国民党两政府政策的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或者根本不愿寻找这个平衡点，而是越来越不择手段地侵夺广大民众的利益，以满足统治集团不断膨胀的贪欲。

作者在经济政策的历史考察和理论探索中，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观点，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如提出了经济政策“近代转型”的标准及其衡量尺度，以此检视民国经济政策的历史脚

步。书中提出，所谓近代转型，就是经济政策从古代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人治为主以维护和调整封建经济秩序的类型，转向近代民族国家以法、依法管理社会经济，维护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类型。民国经济政策即处于这种转型中。其中，北洋政府的转型基本滞留在制定法规、法律的阶段；国民党政府的法制水平亦有限，未能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而是凭借国家政权采取法制及其他非常途径实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转型的脚步尚蹒跚于半途，并已走上岔道。作者提出并运用“官商资本”概念来分析经济政策，也有其独到的见地和意义。同时，作者有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方法，如政策手段、条件的剖析，政策显性和隐性层面的分解与剖析等等。这是在借鉴国外学者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经济政策研究的理论、方法的创新。

总之，《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1912~1937）》是一部构思新颖、内容充实、值得一读的好书。当然，民国时期经济政策涉及面很广，值得探讨的问题很多。由于时间和经验的限制，本书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初步的。一些重要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地方资料的发掘、整理；一些新的观点、论断的阐发、充实和提升；一些重大问题，诸如经济政策的内外环境，中外关系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和制约，经济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前近代社会封建文化、社会政策的积淀及其影响等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尚待时日。我期盼作者更多的优秀研究成果问世。

刘克祥

2005年6月于香江

目 录

序	(1)
引 言	(1)
第一章 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措施及其影响	(5)
第一节 民国建立与经济政策新的发端	(5)
一、民国建立是经济政策的巨大转机	(5)
二、实业热潮的烘托和包容作用	(7)
第二节 政策措施的内容及先行、示范效应	(11)
一、政策措施的内容	(11)
二、财政制约与政策意义的局限	(14)
第二章 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来源的沿袭与变化	(17)
第一节 政治背景与政权性质	(17)
第二节 机构设置与政策“精英”	(21)
一、北京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情况	(21)
二、南京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情况	(24)
三、南京政府留任北京政府人员情况	(31)
第三节 思想基础与舆论倾向	(33)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舆论倾向和政策精英的观点分歧	(33)
二、孙中山经济政策思想的模糊之处和矛盾	(35)

三、“好政府”主义、国家主义	(45)
四、统制经济的思想和理论	(47)
五、国际环境和国外因素的作用	(54)
第四节 两次全国工商会议为政策出台所做的准备	(56)
一、北京政府的首届全国工商会议	(56)
二、南京政府的全国工商会议	(63)
第三章 “规范性文件”及其显示出来的政策内容与导向	(80)
第一节 北京、南京政府的经济法规及其他文件	(81)
一、北京政府法规制定情况与概览	(81)
二、南京政府法规制定情况与概览	(82)
三、南京政府的执政党因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83)
第二节 经济法规的沿革、增益、修改与经济法制建设的 进展	(84)
一、北京政府对清末法规的沿用、增益和不足	(85)
二、南京政府对以前法规的援用	(86)
三、经济法规的沿革、修改和增益示例	(89)
四、南京政府经济法体系的形成与经济法制的进程	(97)
五、从法制史的角度看法规定位及其与经济政策的联系	(99)
第三节 “规范性文件”所包含的政策内容及其导向	(102)
一、鼓励兴办工商矿业与规范经济组织	(103)
二、扶植农林渔牧业及水利建设	(115)
三、保息、示范、奖励及专利等制度的建立	(120)
四、国货、税制与外贸	(134)
五、度量衡、币制与新式金融业	(141)
六、外资与侨资	(149)

七、商会及其他经济社团·····	(156)
八、“规范性文件”政策内容的三个层面·····	(163)
第四章 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的政策手段及其实现目标的	
条件和努力·····	(165)
第一节 权力和财力·····	(165)
一、权力·····	(165)
二、财力·····	(169)
三、二政府财政困难表现形式的异同·····	(176)
四、财力状况对经济政策的制约和扭曲作用·····	(183)
五、财政视角与经济政策的全貌·····	(189)
第二节 政策的经济、财政、金融条件及其变革·····	(191)
一、二政府经济政策的条件与重任·····	(191)
二、关税自主与华洋平等的竞争条件·····	(193)
三、税制改革与简化、减轻税负·····	(198)
四、币制改革与金融环境·····	(205)
五、内外债与资金流向·····	(207)
第五章 民国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隐性层面·····	(214)
第一节 成文法规与政府经济行为所反映的政策显性与	
隐性层面的异同·····	(214)
一、“规范性文件”本身的矛盾·····	(214)
二、政府经济行为是政策内容的延伸·····	(217)
三、政策是多种要素合成的结果·····	(217)
四、若干不等式与政策的隐性层面·····	(218)
第二节 北京、南京政府各自政策的前后阶段及其典型经	
济行为·····	(220)
一、前后阶段的划分·····	(220)
二、典型经济（行政）行为·····	(227)

第六章 民国经济政策的评析	(269)
第一节 经济政策“近代转型”的脚步	(269)
第二节 政策中的诸多矛盾	(274)
一、导向与实质.....	(275)
二、权变与目标.....	(276)
三、需求与发育.....	(278)
四、使命与实效.....	(279)
第三节 “官商资本”的概念与政策中的一些关系	(281)
一、“官商资本”的概念.....	(281)
二、政策与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及“官商资本”.....	(285)
三、政策与外国资本.....	(293)
第四节 政策传统的谬种流传	(296)
一、财政本位的利益分配导向.....	(296)
二、控制垄断的政府行为模式.....	(298)
第五节 经济政策与资本主义发展和早期现代化	(300)
一、经济政策与资本主义发展.....	(300)
二、经济政策与早期现代化.....	(303)
 附录 1 北京政府实业各部历任总长简况表.....	(308)
附录 2 南京政府与经济政策有关的部会主管人员表.....	(311)
附录 3 北京、南京政府兼职者要人表.....	(320)
附录 4 北京政府经济法规概览表.....	(328)
附录 5 南京政府经济法规概览表.....	(334)
附录 6 国民党中央经济类主要决议案一览表.....	(346)
主要参考文献.....	(349)
后 记.....	(354)

引 言

民国经济政策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1945 年二战结束至 1949 年国民党退踞台湾后，由于国民党政权与美国的关系，鲍岳甫（D. S. Paauw）、杨格（Arther N. Young）、费维恺（A. Feuerwerker）和稍后的费正清（J. K. Fairbank）等美国学者，以及在美国的吴元黎、钱端升、薛光前和王业键等华人学者，就开始检视和总结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用他们的专著或在著作中专门加以论述。一时间这个话题成为中国学的热门。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开始较晚也相对薄弱，是随着对北洋军阀史和民国经济史的探讨的深入而引发的专门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早期现代化新命题的展开，近代经济政策及中外比较引起重视。据《中国经济史研究》索引，1986~1995 年的 10 年间发表近代“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管理”的论文近 40 篇。其间，朱荫贵、朱英、石柏林等学者贡献了晚清或民国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专著，外国学者杨格、小科布尔（P. M. Coble Jr）、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的有关论著的中文版先后面世。1998 年，朱英与石柏林合作出版了《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对从晚清到国民政府整个中国资本主义时期的政府政策进行了分段式的研究。

本书将对民国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作贯通性的探究，这在尚属不平衡和薄弱的民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应是一番新

的尝试。1912~1937年，是百年近代中国的经济政策的一个典型时期，是从民国1~26年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虽然发生了1927年的政权更替，但南京政府并非在一张白纸上作画，而是承认了北京政府的债务，留任了它的人员，沿用了它的法规。其间既有延续和沿革，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至1937年，如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近代经济政策也具有了典型性、代表性和一定的完整性。在此以后，中国经济的总量再没有恢复到同等的水平，而经济政策也进入了战时的非常状态，战后则只有短暂的调整和挣扎。为完成这项探究，本书将依次追究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经济政策出台的综合背景，分析众多的政策文件以抽象其中的政策内容，并说明两政府经济法规的沿革和经济法制的进度，考察实现政策目标的权力和财力两大政策手段的状况及其前后变化，透过政府经济行为来充分揭示政策的实质与得失。本书提出经济政策“近代转型”的命题，以转型标准全面衡量民国经济政策的程度和水平。本书试图围绕沿革与变异的主题，将理论与史实相结合，对经济政策进行解析，以求在方法和观点上有所创新。

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的，政府通过税收、预算支出和利率等经济杠杆和政策工具，对市场机制进行干预并利用该机制的作用来影响总需求，以实现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目标。这些理论都有规定的假设前提，所针对的是西方国家一个时期的经济现实；它们本身也在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演变和发展，如20世纪60~80年代西方普遍存在的滞胀局面，又将时滞、预期等因素引入，促使了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和博弈理论的兴起。相形之下，民国时期的经济现实还在新旧交织状态之中，并没有形成可称完备的市场机制；政府干预也常